

茅盾,鲁迅的战友

□陈漱渝

早在青少年时代,茅盾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巨人。我在语文教材上熟读了他的《白杨礼赞》,知道他不仅作品文情并茂,而且还有一番颇为传奇的革命经历。后来在大学读中文系,老师讲左联时期的文学,除开鲁迅杂文之外,作为里程碑式的巨著就只有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国终于出现了巴尔扎克式的“历史的忠实记录员”,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从这部作品诞生直到今天,虽不断有批评家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但也正如鲁迅当年所说:“现在也无更好的长篇作品。”在阅读《子夜》的同时,我又拜读了茅盾用漫谈形式撰写的一部文艺论著《夜读偶记》。一打开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或现代派”,这些概念纷纷扑入眼帘。虽说我至今仍未能领会全书的精神,却深切感受到作者学识的渊博和文学追求的执着。新时期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我第一个想起的典范就是茅盾。后来师兄张小鼎担任《茅盾全集》的责编,陆陆续续寄给我一些样书,我自己也陆陆续续在买,但至今也没买全。我参与编注过《鲁迅全集》,最全的只有18卷,而《茅盾全集》竟多达43卷。可见这是一座看不到顶的山,是一个望不到边的海。

1976年4月,我调到鲁迅研究室工作,关注重点聚焦到了茅盾跟鲁迅的关系。早在“文革”后期,茅盾就以“鲁迅战友”的身份应邀到鲁迅博物馆座谈,留下了一篇《我和鲁迅的接触》的文字记录。但粉碎“四人帮”之后则听到鲁迅晚年跟茅盾产生齟齬的传言,例证之一就是鲁迅去世之后,远在外地的郁达夫都前来奔丧,而作为“战友”的茅盾竟未露面。其实是茅盾在外地接到鲁迅去世的唁电时,因为痔疮发作,不能动弹,仍勉强撰写了一篇题为《写在悲痛中的短文》,刊登于同年11月出版的《文学》杂志7卷5号。而茅盾夫人孔德沚则受茅盾委托,成为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可见这些传言只能伤害当事人的情感,并没有任何研究价值。鲁迅临终前已公开声明:“例如我跟茅盾、郭沫若两人,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或未冲突”,这正说明了鲁迅跟茅盾的一致性。

如果以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为标志,鲁迅作为文坛主将的英姿在中国现实身只有短短的18年,而这18年当中,茅盾跟鲁迅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茅盾跟鲁迅的亲密接触,是鲁迅1927年到上海定居之后,但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鲁迅跟茅盾就成为了“文学知己”。1921年,茅盾跟郑振铎等十余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任职,限于当时北洋政府“文官法”的规定,不能正式参加文学研究会。但鲁迅审定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将自己的创作和翻译提供给文学研究会发表或出版。特别是配合文学研究会译介东欧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从中寻求反抗和叫喊的声音。茅盾当时即对鲁迅的文学活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鲁迅的译著是“不朽的译本”,更加独具慧眼的,茅盾堪称最早给予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特别是所收的《阿Q正传》)以高度赞誉的批评家。他不仅肯定鲁迅把破衣烂衫的泥腿子农民推到了小说创作的中心位置,而且最早指出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读呐喊》),原载1923年10月8日《文学周报》)茅盾在鲁迅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也由此确定。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鲁迅和茅盾是耀眼的双子星座。这一点连进行“文化围剿”的敌人也明白白。在《伪自由书·后记》中,鲁迅援引了以国民党特务系统为背景的《社会新闻》上的一则消息,题目就是《鲁迅沈雁冰的雄图》。仅根据1933年1月至1936年10月的《鲁迅日记》,鲁迅与茅盾各种交往的记载就多达170余次。他们一起为被迫害致死的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遗孀募捐,一起发表宣言欢迎参加远东国际会议的代表。为了建立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事先就请茅盾参与了商议。为了把中国左翼作家的创作实绩介绍到国外,鲁迅跟茅盾共同编选了一个选本,书名为《草鞋脚》,介绍了24位中国当代作家的25篇作品,其中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有茅盾的《春蚕》《秋收》《喜剧》。鲁迅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撰写了《序言》和自传。茅盾也亲笔撰写了《自传》(《中国左翼文学期刊编目》);还共同撰写了该书所选作家作品简介。现在这批珍贵的手稿完整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了鲁迅跟茅盾友谊的物证。

鲁迅去世之后,茅盾为传承鲁迅文化遗产,弘扬鲁迅精神业绩做出了很多工作。鲁迅博物馆现为茅盾致许广平书信6封,内容包括:募集鲁迅文学奖金,筹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墓建碑植树,提供鲁迅书信手稿,保管并交涉鲁迅遗著版权,联系出版《鲁迅全集》……我曾多次瞻仰北京东交道口18号的茅盾故居,茅盾书房书桌上陈放着茅盾临终前的文稿,内容就是回忆鲁迅……

茅盾大约是1975年从北京沙滩文化部的小院搬到交道口来的,我曾有幸在1977年春拜访过他,问了一些有关鲁迅的问题。茅盾不仅热情地一一作答,而且曾用飘逸典雅、自然洒脱的毛笔字复信。有的信已收入《鲁迅全集》第九卷“书信集”。茅盾其时已81岁,我永远忘不了他穿着中式棉袄,边气喘边从后院卧室走到客厅的模样。告别时他又步履蹒跚地把我从客厅送到门口。此时我不禁想起了发生于1936年的一幕:那年10月2日,茅盾陪同美国记者格兰尼奇拜访鲁迅。归途上,格兰尼奇激动地对茅盾说:“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宝贵了!”我想把这句话增补为:“中国有鲁迅和茅盾,是我们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这真是太宝贵了!”

方面是契合的,也就是希望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建构上,有新的探索和坚实的提升。

《子夜》毫无疑问是茅盾文学创作风格最有力的体现。有关这部作品的研究和讨论,从1933年小说出版以来,一直存在,至今不衰。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文学史上的《子夜》现象。一部文学作品在历史上经历完全不同的评价,这在文学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以说差不多所有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都会遭遇到这样的考验。这不仅是考验作品本身,同样也考验着读者、研究者。茅盾创作《子夜》,有非常清晰的写作提纲和事前准备。1980年代出版的《茅盾研究》曾发表过他的这一提纲。将提纲与实际完成的作品相对照,最明显的,是对于乡村世界的描写部分减弱或者删除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上海的城市生活。这一删减,茅盾在晚年回忆录中有说明,大意是精力顾不过来。但就作品而言,这种弱化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不影响对都市生活的表现。如果说,计划中的对1930年代中国社会全景式的描写,后来变成了对193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描写,这样的变化其实并没有改变茅盾文学写作的初衷,因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是现代中国最具变化色彩的文学符号。《子夜》表现的,是真正现实意义上的社会,不仅作品呈现和各种人物关系是现代的,而且所使用的叙事手法也是现代的。这种现代特色,体现为与传统社会脱离之后,上海社会所具有的面向现实和未来的重大矛盾纠葛和社会危机,触及到诸多现代社会的重要元素。茅盾抓住金融投机问题来破解上海都市生活的核心秘密,以此来看待党派政治之争、新旧势力之争、实业与金融投机之争、中外势力之争、劳工与雇主之争。这样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茅盾接纳现代社会科学某种洗礼之后的思想视野和文学着力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理性力量来破解传统诗意的朦胧,茅盾的客观写实探索常常被一些批评者认为叙事有余而韵味不足。事实上,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因为对中国现代都市生活的文学表达,不像对传统乡村生活的文学表达,可以有很多值得参照的现成样板。就现代城市生活而言,上海这样的摩登城市,本来历史就短,要在文学上有所展现,而且要达到很高的诗意境界,实

我的心向着你们

□周明

我的心向着你们!这是先生的肺腑之言。茅盾先生自从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后,虽然在1928年后曾经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然而他在此后几十年中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31年他曾向瞿秋白同志提出过恢复组织生活,但由于当时多种复杂的原因,未能如愿。但他始终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1935年,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他的心也飞向了延安。

1940年5月,他携一家老小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当时他是准备在陕北长期住下去的,只是由于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考虑到他在国统区工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才又动员他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国统区去。他服从了党中央的安排,却把女儿沈霞、儿子韦韬留在了延安(女儿沈霞后来不幸在延安去世)。

茅盾先生回到重庆期间,曾先后在“陪都”重庆、香港和上海等地战斗工作,直到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曾考虑给他安排领导职务和行政工作,他恳切地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我是个作家,希望不要担任行政职务。总理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后来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中央还是任命他担任文化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工作,为国家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不允许在他生前交出这两封信呢?

韦韬说,1980年夏天,先生病情严重住院时,曾有几位老朋友去看望,谈起希望他提出入党事,他极为郑重地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期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了艰难时期。现在我们党胜利了,就不必再提这个问题,去和党分享荣誉。后来韦韬和老人谈心时曾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争取入党的观念淡漠了,没有理想和追求了,产生了信仰危机。听儿子这样一说,他陷入沉思,然后说:如是这样,那我现在倒是要考虑申请入党的事了。从此,他多年的心愿已萌发在心头,所以才有了临终前的嘱托,才有了现在先生的两件珍贵的特殊遗书。

“我的心向着你们”,这是茅盾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先生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心声。先生一生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事业奋斗的精神和大师风范将永驻人间,并将永远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

探索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

——有关茅盾先生文学成就的思考 □杨扬

20世纪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建构,这种建构不是一点一滴,修修补补,而是整体性的、革命性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凡加入这一伟大建构活动中的历史人物,就像汇入长江黄河的无数急流,释放出无穷无尽的巨大能量,也创造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辉煌成就。茅盾作为一代文豪,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这些殊荣与他投身时代潮流,努力探索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密切相关。

茅盾的文学成长不是孤立现象,与鲁迅和郭沫若非常相似,茅盾的文学成就的获得,与他勇于走出封闭的小天地,来到一个开阔的社会空间,感受时代风云的激荡,结交一帮有志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驱人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是离开了绍兴,经由南京去日本,从而获得了人生的解放;郭沫若是脱离了闭塞的四川,经由上海到日本,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气象,那么,茅盾是从浙江乌镇走上海,经由北京求学,后又落户、谋职于上海,在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开始了人生的历练。没有这种广阔的人生舞台的选择,是万万不可能上演他后来的精彩人生。但茅盾与鲁迅、郭沫若也有所不同,年轻时的茅盾没有出国留学的经验,对异国他乡的放逐生活,要到1928年大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后,才有真切的体会。但茅盾比鲁迅、郭沫若幸运之处在于,从开始走向社会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与中国最大的现代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联系在一起。商务印书馆不是单纯的出版机构,而是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的文化中心。茅盾就是在这样一个新式知识生产、出版和发行的机构中开始自己的人生事业。

除此之外,茅盾与鲁迅、郭沫若相比,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这主要表现为茅盾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较之鲁迅和郭沫若若要更深。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从10月开始,茅盾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负责联络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茅盾和他弟弟沈泽民是50多位早期党员中的一分子。从职业身份来看,茅盾是中共党内最早的知名文学家。从1920年参与建党活动开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7年时间里,青年茅盾以职业作家的身份投身于革命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他的职业革命家时期。这段经历,对于茅盾未来的文学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旦用文学形式来表现这些惊心动魄的政治场景和人物故事时,他并不感到例外。以他最初的小说《蚀》三部曲的创作为例,他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小说直观再现了1920年代上半叶大革命时期,中国各种社会力量,以及知识分子和党中下层政工人员的表现。与当时很多青年作者侧重于青春情感直露的感伤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不同,茅盾的兴趣点不在男女情爱上,而在于捕捉社会现实政治力量的重大变化。所以,很多读者会被茅盾作品中那些敏感的时代题材和鲜活的人物故事所感染,尤其是作品中美丽大胆的“时代女性”吸引了无数读



茅盾(1896.7.4—1981.3.27)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文艺报》的创办者。李健吾曾经说过:“茅盾先生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没有一位中国作家比他更其能够令人想起巴尔扎克”。他坚持真理和进步,追求共产主义,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之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茅盾先生临终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时逢茅盾先生125周年诞辰,逝世40周年,本报特与中华文学基金会刊发纪念文章如下,深切缅怀茅盾先生的精神风范和不朽贡献。——编者

心香一炷祭茅盾

□李小慧

今年的7月4日是我们尊敬的茅盾先生125周年诞辰,他离开我们也有40年了。我和茅盾先生的孙子沈韦宁联系,他身在海外因疫情无法回国,但深深的怀念之情直抒胸臆,他委托我联系亲朋和挚友到茅盾故居拜谒先生。我们带着他的一捧鲜花和心香一炷,在茅盾先生生前的居住地回顾老人家的一生和他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茅盾先生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还懵懂无知,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历史地位的人。他在我眼中就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就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并没有特别珍惜和这位老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日常,总觉得日子有的是,根本不去想他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会老去。但是,在他离开我们40年的每个日子里,无论是文学界、出版界,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无论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人还是其他行业的人,无论是老百姓还是专业研究人员,对茅盾先生留下来的思想及文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没有被人们遗忘,无处不在,而这位老人的音容笑貌就像驻在我们心里,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连他从解放初期到70年代工作和居住的文化部宿舍“朝内大街203号”大院子里的“毛孩子”都时常聚在一起追忆和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他文章里提到的“四条汉子”——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前三位和不少文学大家都曾是我们的“邻居”。春天里,我曾看到茅盾爷爷驻足花坛旁边静静地赏花;夏天时,我也见到过这些在文学界身居高位、备受尊重的爷爷们穿着大背心、摇着蒲扇到院子里的路灯下观看象棋大战;秋天来了,他们有时会站在自家的小院门口怅然地若有所思;冬天,他们会在我们堆砌的雪人旁停留观赏片刻。那时的我们,在他们周围奔跑嬉戏、调皮捣蛋,抑或擦肩而过,他们回报以慈祥的微笑和亲切的劝说。老一辈卓越的文学成就,非凡的人格魅力,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珍宝和丰碑,我们在他们身边度过的快乐童年,也就成了我们至今深刻而温暖的回忆。

2015年“203大院”的儿时玩伴再聚,和历年一样,沈韦宁如约而至,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依旧是无拘无束,依旧怀念过往。但我们毕竟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我们竟然也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那年,我时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想着尽己所能为中华文化传承多做一些工作。后来的聚会几乎就定了策划会,我们得到沈韦宁的授权,共同合作设立了“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意在奖励有突出成就的青年文学家。第一届颁奖工作完成后,我们考虑到青年人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参与的广泛程度和发展速度,从第二届开始,就与“阿里文学”联系,在“茅盾文学新人奖”中增设了“网络文学新人奖”,将网络文学作品纳入评奖范围,就是想给这个新的文学群体以支持和鼓励。这一设想得到了文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近年来,我们又与“学而思”进行了一些文学方面的合作,也是希望能为培养青少年的文学理想和在文化传承方面做一些工作,以继续完成茅盾先生的遗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引用了茅盾先生的一段话:“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就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要求,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化更大的繁荣和发展,这才是对茅盾先生和他那一代先驱者们最好的纪念。也正如他老人家期望的那样:“青年!你们背上的担子是一天重一天,你们的生命之火向改造社会那条路上燃烧,决不可向虚幻的享乐道上燃烧。”党和国家就是希望年轻一代作家们积极地反映生活、创造生活,我们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之努力。

最后,我用萧伯纳的一句名言作为结束语: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由我们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